

种菜的教授或做教授的农夫

□ 刘锦涛

我与他,尚不能算朋友。他是我妹夫的远房亲戚。某一年,我因患疾,通过妹夫找到了在那家三甲医院做教授的他。医院人山人海,有病的人和无病的人,来到这里,都成了有病的人,晕头转向,分不清南北。他带着我,出入相关的门洞,从上午到下午,花了整整一天时间。要是没有他的带路,或许一次只能看一个项目,等待化验结果,或许要等到第二天了。这个过程中,不断有人和他寒暄或向他请教有关医学上的问题。到傍晚离开医院的时候,我已筋疲力尽,他却好像已经习惯了这种忙碌,依然精神饱满。

过后,我让妹夫向他表达感激。妹夫说好的。又说,也没什么,他对谁都是热心的,忙是他的常态。

那一次看病,印象深刻。那天,他穿白大褂,口罩一会戴上,一会又拿下来。中等身材,不胖不瘦。头发尚黑,不做打理,却也不乱。印象深的是他的口音,普通话,崇明话,上海话,相互夹杂交织,成为他移花接木后创造的特殊语言。这是听他与别人说话时听见的。他与我说话,依然标准的崇明腔。

后来的许多年,我与他没联系。从妹夫的嘴里得到他的一些消息,说他退休了,依然忙,本地外地,开会,学术活动。又过了几年,又说他现在经常回崇明,做什么? 种菜。我没感到惊讶。不少人退休了,没事找事,回到

从小长大的乡下,种一块地。种地是蜻蜓点水式的,聊以打发时间,也趁机踏青,看景,透透新鲜空气。毕竟现在有私车,交通也方便。

又一次,妹夫说,他有一块菜地转给教授种了。我问为什么,说家里的地嫌多,种的菜吃不完,正好教授喜欢种菜。又问教授吃得了那么多菜吗? 说城里的朋友都喜欢他种的菜,每次回城,大包小包,分好,装车,通知他的朋友,新鲜的菜,活的菜,来了。并约定到达的大概时间,等在什么地方。我又问,他有多少朋友啊,妹夫说这个知道了,反正每次都要带回城里一整个后备箱的菜,估计人不少吧。

一副场景出现在我的想象里:多个人站在某个约定的地点,伸长了脖子,摆出望穿秋水的样子,盯住每一辆路过的汽车。直到他的车抵达,看他停车,卸货。那天的晚餐,这座城市里的几家人家,有了一份或几份当天采摘的崇明菜。春夏秋冬,各有不同。关键是,这个菜是一个教授——不,是自己熟悉的人,自己的朋友亲手种出来的。

一个教授,退休了,摇身一变,成为农夫了。我心里想,他到底是农村出生,上了大学,离开了农村,做了几十年教授,却依然是一个农夫的命。

今年三月的某个上午,我去妹妹家,妹妹正好在自己的菜地里,我随即去了菜地。在她家菜地的隔壁,我看

见了教授。他也看见了我,撑着一把锄,与我挥手,我也一边挥手一边走过去。算算时间,从城里赶来,他应该是起了一个大早的。

他在挖芋艿。去年的芋艿埋在地里,地面上罩了一层稻草,不烂。我说你的地里藏着宝贝啊。他说把芋艿挖出来,一部分可吃,另一部分做种子。又要下种了。

我笑,又要下种了。三月未过,真正的农民,尚未进入忙期,他却开始忙了。我观察他的菜地,菠菜,青菜,大蒜,广生,青枝绿叶。另一边的一块土地,地面覆盖着尼龙薄膜,种好的土豆尚未出苗。还有翻耕好的白地,在等待下种。

再过一段时间,这块土地将是另一番春意盎然的景象。

眼前的教授,外衣脱了,露出一件浅色旧毛衣,头发零乱,脚上一双高筒胶鞋,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民的日常穿着。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,或许昨天,他还在某个学术活动上侃侃而谈,今天一转眼成了一介农夫。讲台上的教授,与纷乱忙碌的世界融为一体,一旦离开讲台,驱车回乡,便进入另一个世界。一个世界嘈杂,一个世界安静,昨天红尘滚滚,一转眼,已站在红尘之外,经营一块自己的土地,在上面播种,耕耘,然后采摘,茄子,芋艿,扁豆,番茄,生菜,青椒,土豆,青菜,所有植物的模样都是微笑的模样,

普渡众生的模样。

他的菜地真是漂亮。所有的种植,棱沟也好,菜的间距也好,横平竖直,经纬分明。没有一株杂草。裸露的泥土,细沙般柔和,令人想到过年时经过模数最高的绢筛筛过的米粉。一块菜地,看得出主人的精心安排,且有无言言说的洁净之感。

我说,教授你很辛苦啊。他说,他本来就是一个农民,不敢荒了自己的手艺。

他说,有一块地种种,感觉踏实。而且这块地,他在年轻的时候就种过的,原来高低不平,笕田,稻田,后来全生产队挑灯夜战,平整成现在的样子。我说这样的生活,我也有过,平整之前,祖先的骨殖已经迁移,平整的时候,挖出了无主的骨殖,无主其实原来总是有主的,或许他们是土地曾经的主人。世上从来没有永久的主人,易主,是一件习以为常的事。将曾经的主人在某条河边安顿好,继续平,改天换地啊。他说,再改天换地,人,总逃不出土地。看似我们在经营土地,其实是土地将我们抓着,寸步不离。

我问他今天回城吗,他说回的,明天还有一个学术活动。

我说,你是教授,又是农夫啊! 他笑笑,说其实没什么不同。

天上白云,散淡而又悠然;北面的林子里,有鸟在叫。这个世界很有秩序,各自忙碌。

难忘乡村的露天电影

□ 叶振环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乡村大队办事处操场上放露天电影的情景,至今想起仍令人激动不已。

崇明岛的夏夜总比别处来得早。当最后一抹晚霞坠入长江口,南海村的晒谷场便浮起一层淡青的暮色。这时,村东头土墙上歪歪斜斜的“今晚放映《地道战》”几个粉笔字,早被孩子们用指甲抠得凹凸不平。

村口老槐树下的石碾旁,放映员老周正在擦拭胶片盒。他总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,腰间别着串黄铜钥匙,走路起来叮当作响。我们这些孩子最爱围着他转,看他从木箱里取出银幕时,总忍不住伸手去摸那雪白的帆布。

“小国们,搭把手!”老周笑着把幕布拉直。我们便争先恐后爬上竹梯,看幕布在晚风中徐徐展开,宛如长江涨潮时鼓起的船帆。幕布四角的麻绳系上老槐树粗壮的枝丫,惊起一窝麻雀,扑棱棱掠过晒谷场边金黄的稻草垛。

天完全黑透时,晒谷场已成了星光的海洋。乡亲们自带的小板凳像雨后的蘑菇冒出来,蒲扇摇动的声响里飘着艾草驱蚊的清香。张家姆妈抱着熟睡的婴儿,把竹椅让出半边;李家阿公的烟袋明明灭灭,烟锅里炒豆似的哔剥声和着远处的蛙鸣……

突然一道光柱劈开夜色,晒谷场瞬间安静。胶片转动的沙沙声里,银幕上跳出“新闻简报”四个大字。穿军装的女拖拉机手、起伏的麦浪、冒着烟的高炉,这些黑白影像在夏夜的露水里洩开,又被此起彼伏的惊叹声重新勾勒清晰。当“八一”红星在胶片划痕中闪烁时,后排忽然爆发出欢呼声——正片开始了。

记得最难忘那次放《英雄儿女》。放到王成高呼“向我开炮”时,天上突然滚过闷雷。雨点砸在幕布上噼啪作响,老周慌忙盖机器,人群却像被钉在雨中。银幕在风雨中飘摇,英雄的身影时而拉长时而扭曲,混合着雨水的泪水在每个人脸上流淌。直到胶片卡住发出刺啦声,大家才惊觉浑身湿透,却仍意犹未尽地讨论着剧情。

散场时银河已斜到芦苇荡那头。大人们举着手电筒,光晕里晃动着归家的剪影。我们赤脚踩着露水未干的田埂,把玉米秆当爆破筒,学电影里匍匐前进。稻田深处传来守夜人驱赶田鼠的梆子声,和着此起彼伏的“为了新中国前进”的童声,惊飞了几只夜鹭。

记得最后一次在村里放映战斗故事片《战上海》,那是1968年秋天的一个晚上,父母和哥哥吃完晚饭,早早拿着板凳去村办事处操场等候露天电影的放映。我呢,看见邻居阿哥在甘蔗地里浇水,于是我也放弃看电影,一次次手提木桶水,来来回回地在自家三分甘蔗地上浇水,等他们看完电影回家,我刚刚把甘蔗地的水浇完。这是我参军前为家里人的最后一次付出,至今依然记忆犹新。

如今晒谷场早已铺成水泥地,老槐树的位置立着太阳能路灯。去年清明回乡,看见老周躺在竹椅上打盹,那台长江牌放映机静卧在墙角,胶片盒里钻出几株野麦苗。暮色中,恍惚又见银幕升起,旧时光在斑驳的墙面上晃动。原来那些夏夜从未远去,它们化作星辰落进长江,随着潮汐在记忆的滩涂上年复一年地涨落。

小店·守店人

□ 张绥娟

春天收了一些芥菜,母亲要腌“盐齏”,发现没了盐。我自告奋勇:我去买! 准备开车去镇上。母亲说:去小店里买吧。

“小店还在?”我惊喜。我平时开车总是全神贯注,从来不在意路边的事物。记得妹妹说过小时候那家小店一直在的。当时我还问过:“还是老杨在里面?”“嗯,不过现在好像给国新了,老杨年纪大了。”国新是老杨的儿子。

“那我走过去就可以。”怀着十二分的期待,揣着十二分的亲切感,我走向一里多外的小店,脑子里许多温馨的片段。

周家河头曾经有一座宽宽的漏空木桥,木桥近处南北向公路旁边有一家小店。很久远之前,父亲带着我买东西,我望着高高的柜台上个糖果瓶子,父亲问我要哪种,我犹豫着不说,心里想最好每样买几颗。

老宅邻居家比我大两岁却长一辈的玉英说:小店里要卖鲜带(鱼)了! 母亲急忙吩咐我跟着玉英去排队。于是,小店门外几个篮子或几块砖头排着队,一群小伙伴玩着游戏。

木排门,两开间,木柜台上叠放几个方形大玻璃瓶,货架上一些日用品,货架边几个乌坛,上面有“鲜酱油”“红酱油”“五加皮”之类的大标签。我长到能“打酱油”的年龄时常去买小杂物,很少买零食,偶尔买个月饼,弟弟出生后家里才舍得买杏仁饼干。

我不知道小店最先的主人,我能买东西的时候,它是供销社的下伸店。营业员不止一个,记得两个年轻人都叫什么“超”的,和年长的老杨轮流上班。我小时候的印象中,小店里除了衣服鞋子别的好像什么都有。但是,上了中学很少去,一次和同学一起骑车经过,同学读着店门前小黑板上的告示:“米蜡到货。”又问:“米蜡是什么?”我回头一看,是“米醋”,顿时一阵欢笑。

之后似乎不再和小店接触。没想到,它一直在,且这么多年了,守店人虽然少了,却也一直是原来的人。

老杨,我们隔壁宅上的一个长辈,方脸,表情很少,行动缓慢,青光眼。他小儿子和玉英一样大,我们常去他家玩,但是很少看见老杨。他似乎不属于家里,只属于店里。

我脚步匆匆,可不时又停下来,避让更匆匆的车辆。小时候感觉宽大的公路,如今在两旁“枝枝相覆盖,叶叶相交通”的樟树掩映下,有几分隧道的意思。处于两个比较热闹的小镇之间,这段路上的车辆都不由得疾驰起来,我仿佛比小时候胆小许多,听到声音就停下脚步,侧身等着汽车驶过再向前走。

就这样慢慢吞吞到了小店,抬眼一看,记忆中的旧影倏地被刷新——店门外一个凉棚,下面坐着三四位半老头,我注目辨认了一下,没有一张脸“似曾相识”,他们也看了我一眼,又回头聊天——可以确认不是我小时候一起排过队的伙伴。我再看向他们身后,确实确实的一个木排门的店面,可除了木排门,别的一切都不复记忆中的旧影,两间开的店面左侧还有小屋,门窗紧闭,不知道是不是仓库。

店面已经是半开放式,柜台是玻璃的,里面有一些小货品。柜台里既不是老杨,也不是国新,而是一位年纪和我相仿的女子,一定是国新的妻子。她身后的货架上除了日用品,还有香烛之类的货物。我收回预备好的和老邻居久别重逢的心情,问:“有没有不加碘的盐?”女子认真看我一眼,朝我身后努嘴说:在那里,你看。我身后也是货架,也放着不少商品,盐只有一种,加碘的。

我又问:“只有这种?”“不加碘的没有,要么你到镇上买。”她倒不愁生意不成,脸上有着和老杨相似的平静,我确定并非因为我买盐这生意太小



《紫气东来》(国画) 季云龙

了。见我迟疑,她回头和闲坐的人继续聊天。

我没再打扰他们,路边就是车站,一辆公交车正驶来,我上了车,到再一里多外的镇上……

其实,这样的小店在乡间有很多。我婆婆家附近有一家叫“杜青小店”的,原本我婆婆和乡邻刘阿姨、杜青轮流在那里上班。后来就只有杜青了,后来杜青走了,刘阿姨承包了小店,店名仍旧是“杜青”。

几十年来经过小店,先是听到杜青的热情招呼:“长脚(我先生是高个子)! 跌跤把紧地皮哦。”后来只有刘阿姨和小店一起慢慢苍老,如今,小店营业时间随刘阿姨的心情而定,远远望去,刘阿姨的轮椅在小店就开着。常常还有另一辆轮椅,是一位独居老太,有时候还有别的闲聊的人。

我一度以为小店没有多少生意,在飞速发展的时代,城镇的商场、店铺歇业的不计其数。可是这些“散落”在村口、“河头”的小店能支撑这么久,守候那么久,仿佛是奇迹。

店里的货物多为包装较小,价钱便宜的。大概正是因为那些闲坐聊天的人,没有能力网购,急用小物品时集镇又太远,小店恰好提供了贴心帮助。我曾常常看到我婆婆叫我公公去小店买酱油、打火机,或者雪糕之类的,几分钟就走了个来回。

小店像是乡村的毛细血管末端,微小,又不可或缺。那些守店人,与小店和乡邻同气连枝,他们不必急于功利,自有一份收入养家。他们的淡然,正是一份笃定和满足吧?

这样,小店的坚韧不倒就不是奇迹了。